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嵌入全球价值链： 影响因素、现实挑战与策略选择

夏杰长 徐紫嫣 袁航

摘要：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视强化本国在全球范围内的价值链嵌入和提升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在嵌入全球价值链进程中，中国制造业的成效比较明显，但作为制造业升级重要支撑的生产性服务业则存在明显不足。生产性服务业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并提升其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生产性服务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以及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受到数字技术、制度环境、对外开放、产业结构和出口产品质量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嵌入全球价值链总体还比较落后，大多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生产性服务业企业技术提升程度有限，服务贸易竞争力较弱，生产性服务业开放程度有限，全球价值链框架下生产性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的良性互促还有待加强。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从提高生产性服务业在国内价值链中的地位、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发挥数字经济赋能作用、积极有序扩大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等方面发力。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43(2024)10-0001-13

近40年来，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基本趋势表现为全球价值链的展开和深化。在开放经济背景下，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视强化本国在全球范围内的价值链嵌入、提升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深度参与国际分工和合作、嵌入全球价值链，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在嵌入全球价值链进程中，中国制造业的成效比较明显。中国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提升全球产业竞争力，离不开生产性服务业的有力支撑。近些年，经济服务化现象更加明显，服务业结构也在不断优化升级，以科技研发、金融业、创意

设计、专业服务、知识产权和现代物流为代表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备受关注。但是，就嵌入全球价值链及其位置测度这一议题而言，主要还是聚焦制造业，对服务业涉足较少。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知识化，厘清生产性服务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因素和实现路径，是一个较新的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一、相关文献综述

生产性服务业贯穿于企业生产的上游、中游

基金项目：上海社会科学院重大系列课题“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水平测度与升级研究”(2024ZD037)；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国家试点科技政策与竞争政策协同影响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效应、机制及政策优化”(72203152)；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资助计划项目(DF2023ZD21)。

作者简介：夏杰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徐紫嫣，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袁航(通信作者)，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和下游,涉及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等产业的多个环节,专业性强、融合度高,带动作用比较显著,能保证工业在生产过程中的连续有效运行,促进产业升级,提高生产效率,已经成为全球产业竞争的重要领域。此外,生产性服务业还能有效激发内需潜力、扩大就业、改善营商环境,引导企业打破“大而全”“小而全”的格局,分离和外包非核心业务,推动由生产制造型向生产服务型转变,引领实体经济向价值链中高端延伸和产业高质量发展。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不断提高中国参与国际分工深度和广度,扩大生产性服务业开放程度,对于新时代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更加专业化和高端化的生产性服务业将成为推动实数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

伴随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各国家(地区)间经济联系愈加紧密,数据流动和国际分工日益加深,加速了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的建立。事实上,大多数生产性服务业属于知识密集型产业,其信息化和专业化能力较强,能以“桥梁”的角色链接生产中的各个环节,同时也能够单独作为生产或销售的一个部分参与国际分工,积极带动跨国公司在不同地区间进行信息交流和商品流通,使国际分工更加细化,促进生产要素优化配置,提升一国内部生产效率和竞争力,从而加速全球产业链顺畅运行。而生产性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则是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全球分工,主要通过将服务划分为各种生产任务并分配至各个国家和地区来实现利益最大化。服务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位置反映了一国或地区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以及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

此外,生产性服务业以其强大的研发能力和融合渗透能力具有掌控整个价值链的核心功能,并在全球价值链的系统整合中占据关键地位^[1]。其中,美、日等发达国家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时间更早、发展程度更深,它们利用其先发优

势从事研发、设计等全球价值链上游服务,而印度通过服务外包产业不断提高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2],同时也促进了服务业和制造业的深度融合^[3],提高了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前向参与度和后向参与度^[4-6]。引入国际竞争和吸引外商投资,还能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7-8],有助于提升研发能力和服务能力,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增强国际市场参与度,提高国际分工地位,增强中国国际竞争力^[9]。

目前,已有学者尝试采用不同方法对生产性服务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进行测度。一般来说,服务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主要通过计算一国国内要素占跨国生产分割活动的比重、一国最终产品来自全球价值链相关生产和贸易活动的比重,以及其前向生产长度与后向生产长度所占比重进行测算^[10]。此外,也有学者通过投入产出表计算前后向关联系数来研究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程度和位置,或者使用垂直专业化指数 VS^[11-12]、增加值出口 VAX^[13-14]等指标来进行测度。他们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上活动主体数量不断增加、新兴产业占比逐渐上升且分工程度不断深化,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参与领域从运输、批发等传统产业逐步扩展至软件、会计审计服务等新兴产业。总体而言,就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参与度而言,中国呈现前向参与程度低而后向参与程度高的特征,说明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获利能力较低,面临低端锁定的风险^[12]。虽然近年来中国服务领域开放程度不断增强,但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水平依然不高,普遍被锁定在低附加值环节,遭遇低端锁定和低端转移的困局^[15-16],但是在发达国家尚未形成稳定垄断地位的信息技术、电子通信服务等数字和新兴服务类行业等领域,中国的发展势头相对较好^[17-18]。

已有文献对制造业的研究相对较多,但关

于制造业的测算研究方法并不完全适用于生产性服务业。目前,以服务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情况作为研究对象的文献还较少,少量文献基于相对成熟的全球价值链地位理论进行了研究,而专门对生产性服务业嵌入全球价值链方式与路径等议题的研究较少。从这个角度讲,本文的研究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全球价值链领域的研究视野。当前,中国正处于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历史时期,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程度的发展状况如何,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存在哪些问题、面临哪些挑战以及可能的提升路径有哪些等一系列问题都亟待解决和回答。

二、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现状分析

(一)生产性服务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整体状况

生产性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嵌入程度对中国服务业发展及国际竞争力提升具有重要作用^[9]。根据现有文献来看,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状况可从两个维度进行分析。

从参与度角度看,基于全球价值链的生产分解来研究^[20-21],现有学者利用出口增加值衡量产业的价值增值能力,通过计算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前向和后向参与程度分析其在国际分工中的参与度。若前向参与度高,则说明该产业大多通过向国外出口中间产品来获取国内贸易增加值,但若后向参与度高,则说明该产业部门的贸易增加值更多是从国外进口的中间产品中取得的。两者相加表示一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嵌入程度,此时,数值越大,说明该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程度越高。在此,选取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UIBE GVC数据库和ADB MRIO数据库对目前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的嵌入状况进行测算,因为相对于WIOD数据库,其数据涵盖的国家更多,且更具时效性。参考韩沈超^[2]的研究,将ADB MRIO数据库中的C23—

C28、C30行业^①归为生产性服务业,根据数据库数据绘制出中国2007—2020年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演变趋势表,其中,表1(下页)为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表2(下页)为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后向参与度。可以看出,第一,从前向参与度来看,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前向参与度呈逐年下降趋势,前向参与度相对较高的行业主要为航空运输业(C25)和水运业(C24),而邮电业(C27)、金融中介租赁业(C28)及内陆运输业(C23)则较低。从前向参与度演变幅度来看,航空运输业(C25)的降幅最为明显,从2007年到2020年共下降了0.30,邮电业(C27)、金融中介租赁业(C28)及内陆运输业(C23)的下降幅度较迟缓。第二,从后向参与度来看,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后向参与度整体上变动没有前向参与度明显,但也呈现波动下降状态。从后向参与度水平高低来看,后向参与度最高的行业为航空运输业(C25),最低的则为邮电业(C27)。

从嵌入位置角度来看,如果产业的前向参与程度较高,则该产业具有更强大的价值创造和盈利能力,在全球生产链条中处于上游地位。由于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具有“前向低、后向高”的特征,在全球价值链中仍处于偏向生产中下游的环节,说明当前生产性服务业的价值创造和盈利能力并不强,这可能导致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附加值和利润相对较低^[12]。有学者的研究发现,2020年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嵌入位置指数为1.05,处于中等水平,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前向参与程度不高,但嵌入位置表现尚可,这主要源于中国金融、电信等行业的国际竞争力较强^[2]。营商环境、要素质量能显著提高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而创新能力则能显著提升生产性

①生产性服务业包括:内陆运输业(C23)、水运业(C24)、航空运输业(C25)、其他辅助运输活动(C26)、邮电业(C27)、金融中介租赁业(C28)和其他商业活动(C30)。

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22]。

(二)生产性服务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存在区域差异

加入国际分工后,中国始终在加强与全球价值链中其他经济体之间的关联程度。中国生

产性服务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存在较为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研究发现,由于地理位置、政策制度等原因,北京、上海、广东等东部沿海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参与国际贸易和专业化分工更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也更高,而青海、湖南、西

表 1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的前向参与度

年份	C23	C24	C25	C26	C27	C28	C30
2007	0.13	0.28	0.41	0.09	0.08	0.11	0.20
2008	0.14	0.30	0.42	0.12	0.08	0.11	0.19
2009	0.11	0.24	0.34	0.10	0.06	0.09	0.16
2010	0.13	0.30	0.37	0.13	0.06	0.10	0.16
2011	0.13	0.28	0.35	0.14	0.06	0.10	0.16
2012	0.13	0.25	0.31	0.15	0.05	0.10	0.15
2013	0.12	0.22	0.28	0.14	0.05	0.10	0.14
2014	0.12	0.21	0.25	0.13	0.05	0.10	0.13
2015	0.11	0.20	0.24	0.12	0.04	0.09	0.13
2016	0.10	0.19	0.22	0.12	0.04	0.08	0.12
2017	0.10	0.20	0.23	0.12	0.04	0.09	0.12
2018	0.10	0.18	0.20	0.12	0.04	0.08	0.12
2019	0.08	0.13	0.12	0.12	0.04	0.07	0.09
2020	0.08	0.12	0.11	0.11	0.04	0.07	0.08

注:数据来源于 UIBE GVC 数据库和 ADB MRIO 数据库。

表 2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的后向参与度

年份	C23	C24	C25	C26	C27	C28	C30
2007	0.11	0.14	0.20	0.13	0.11	0.05	0.15
2008	0.11	0.14	0.22	0.14	0.10	0.05	0.15
2009	0.09	0.13	0.19	0.12	0.08	0.04	0.13
2010	0.10	0.13	0.20	0.13	0.09	0.04	0.15
2011	0.11	0.14	0.22	0.14	0.09	0.05	0.16
2012	0.10	0.13	0.22	0.13	0.08	0.05	0.16
2013	0.10	0.13	0.22	0.13	0.08	0.05	0.16
2014	0.10	0.12	0.21	0.12	0.08	0.05	0.16
2015	0.09	0.11	0.19	0.11	0.07	0.04	0.14
2016	0.08	0.10	0.18	0.11	0.07	0.04	0.13
2017	0.08	0.10	0.18	0.11	0.07	0.04	0.13
2018	0.11	0.13	0.22	0.14	0.11	0.06	0.16
2019	0.10	0.12	0.21	0.13	0.11	0.06	0.17
2020	0.06	0.08	0.14	0.08	0.07	0.04	0.11

注:数据来源于 UIBE GVC 数据库和 ADB MRIO 数据库。

藏等中西部地区则更多参与国内范围的区域间贸易,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相对较低。目前,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嵌入主要以东部沿海省份为主,中西部地区主要借助长三角、珠三角及京津冀经济一体化发展与东部沿海地区形成国内关联网络,间接性地参与全球价值链^[23]。与此同时,全球价值链的嵌入程度具有明显的周边效应,虽然长三角、珠三角及京津冀区域周边省份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不及沿海地区,但比非周边甚至更远的内陆省份的参与度高^[24]。因此,不可忽视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的嵌入具有与内陆省份割裂的问题,且各地区的嵌入程度差距较大。

(三)生产性服务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存在行业差异

近年来,随着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的持续演变,新活动主体和新兴产业的加入扩大了生产性服务业价值链的覆盖范围。由于不同产业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我国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参与中呈现明显的行业异质性。总体而言,中国传统服务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程度较高,但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和高技术类的新兴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还不太成熟,在全球价值链中竞争力仍有待提高。其中,生产性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明显要高于其他类型的服务业,这也凸显出生产性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嵌入程度对中国服务业发展及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重要作用^[19]。研究发现,运输、批发等传统服务产业目前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已经进入稳定状态,这主要得益于2010—2014年中国在运输服务贸易的进口水平提升迅速,成功吸引了多国运输服务贸易出口,成为亚洲重要的关联中心^[12]。而随着中国开放程度的提高,金融服务业及法律、软件和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可能会出现转移的情况。近年来中国在人力资本等高端资源要素上加大了投入力度,金融、通信等生产性服务行业始终呈现前向参与度不高而嵌入位置较高的情

况^[3]。此外,与信息技术、科学研究等相关的新兴高技术服务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相对较低,在这些行业内,中国依然比较依赖国外提供的中间产品^[23]。由此,虽然总体上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的核心地位由欧美发达国家主导,但它们在信息技术、电子通信服务、金融等数字和新兴服务类行业尚未形成稳定的垄断地位。因此,中国在该领域的发展依然具有相对较好的发展势头^[17-18]。

三、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因素

(一)数字技术因素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加速了大数据、5G、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极大程度上降低了因信息不对称或隐匿信息而导致的市场不确定性和交易风险,从而降低了生产性服务业的交易成本。此外,数字技术应用能加快信息交流,增强数据处理能力,有助于优化要素资源配置,提高服务业生产效率,进而提升生产性服务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特别是对数字技术应用要求高、信息技术密集的行业具有更为显著的促进作用。在现实中,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会进一步加快信息化发展,并由此衍生新的服务外包市场需求,延长产业链,增强一国承接离岸服务外包的国际竞争力^[25]。数字技术还可以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深度融合,实现制造业服务化,从而提高产品附加值和竞争力。这种延伸和升级有助于生产性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更高的位置。此外,数字技术应用缩小的全球劳动力成本差距还会带动形成区域价值链,强化平台驱动对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全球价值链高位嵌入^[26]。总之,数字技术对生产性服务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影响是复杂且深刻的。数字技术可以降低信息不对称、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效率,从而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嵌入全球价值

链,同时需要关注其带来的风险和挑战,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应对。

(二)制度环境因素

公平且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高效的审批效率、贸易与投资自由化、规范透明的市场制度、社会和文化环境、完善的法规体系和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都能显著深化国际分工,增强企业跨国合作,有助于带动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因此,完善的制度环境和较高的制度质量是确保一国攀升全球价值链高端的重要因素^[27]。通常而言,良好的法治环境、高水平的人力资本、放宽服务业准入,都有助于有效节约要素交易成本和激励高水平服务业开放,这不仅会影响服务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而且会显著提高一国服务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位置。其中,研发支持结构、产业结构和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在此过程中起到明显的调节作用^[28],而贸易自由化和信息网络的高速化为生产性服务业价值链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技术和制度基础^[12],比如,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政策能够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使企业更容易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和合作;信息网络的高速化则能够扩大企业的交互范围、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提高运营效率,使企业更容易融入全球分工和合作体系。总之,制度环境在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稳定、开放、包容、透明的制度环境能够为企业提供更多的发展机遇和空间,有助于其提升竞争力、拓展国际市场、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各国政府应致力于优化制度环境,为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三)对外开放因素

对外开放程度是影响生产性服务业参与或嵌入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因素。一般而言,通过扩大服务业开放,更大力度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生产性服务业企业或机构可以获得更多的知识和专业管理经验,增强其服务创新意愿,提

高其服务质量和效率,从而提升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需要指出的是,生产性服务业对外开放助力其提升全球价值链是有门槛效应的。比如,生产性服务业的垂直化水平通常会伴随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而逐渐上升,且对外开放度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存在门槛效应,即只有当服务业和制造业协调发展程度与制度质量分别都跨过一定门槛值时,对外开放度才能显著提升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29]。不可忽视的是,参与全球价值链能促进一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但因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在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等方面的差距,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提升程度和提升方向上存在差异^[30]。总之,对外开放水平对生产性服务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通过提高技术引进和吸收能力、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创新升级以及提升劳动力素质等方面的努力,生产性服务业能够更好地融入全球价值链,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四)产业结构因素

当市场需求对高质量、高技术含量的生产性服务需求增加时,会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不断升级并嵌入更高层次的全球价值链。同时,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会带动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提升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这是因为,产业结构升级和新型工业化有利于增强知识和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对外开放程度,进而引致要素禀赋优化和升级,持续推动产业结构由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由制造业品牌向服务业品牌转型,提升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31-32]。从长期演化视角来看,生产性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演变、位置和分工程度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制造业因其发展对生产性服务业精细化、模块化、标准化需求加快,以及企业追求竞争优势的目标,均为确立生产性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提供了强大动力,提高了生产性服务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深度和位置^[12]。一

一般而言,发达国家的生产性服务业比较发达,与制造业融合的能力强,出口附加值高,更容易嵌入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发展中国家则是以传统工业和生活性服务业为主,专业知识含量较高的生产性服务业普遍比较落后,因而主要是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发展中国家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推动传统工业向现代工业转型,并大力发展专业知识密集型主导的生产性服务业。

(五)出口产品质量

出口产品质量是影响生产性服务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程度和方式的因素之一。这是因为,出口到国外的产品质量,除了设计制造环节本身,还与产品设计、外观包装、运输管理和品牌服务等各个环节密切相关,而这些又基本属于生产性服务业范畴。通常而言,高新技术产业位于全球价值链的上游环节,其产品具有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等特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因而该产品的顺利出口能够直接提升本地区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度^[33],并在很大程度上深化生产性服务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深度。值得一提的是,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受到要素质量的影响,就高附加值的服务行业而言,较高质量的要素在全球价值链升级中往往占据重要地位。因此,产业间人力资本配置结构^[34]、贸易结构、贸易方式、贸易流向的改变^[35],以及其他可以提升要素质量的途径都有助于提升生产性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总体来看,高质量的出口产品能够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从而推动生产性服务业的国际化发展,更加主动提供跨境服务,这有助于生产性服务业嵌入全球价值链,获取更多的国际资源和市场机会。未来,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需要不断创新和升级,以适应全球市场竞争的加剧和制造业对高质量生产性服务业日益增加的需求。

综上所述,生产性服务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数字技术因素、

制度环境因素、对外开放因素、产业结构因素和出口产品质量等。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生产性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嵌入程度和地位。

四、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嵌入全球价值链面临的现实挑战

(一)生产性服务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中低端

服务领域的持续开放加快了生产性服务业融入全球分工网络的步伐。在所有参与全球价值链中的服务业类型中,生产性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较高。但是,相较于发达国家,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仍然处于中低端位置,所获得的附加值和利润相对较低。这是因为,虽然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在近些年来得到了显著发展,但在高端技术和服务领域存在自主研发能力、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难以形成自主技术优势。总体来看,生产性服务业各行业的全球价值链是由欧美发达国家带动的,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在整体上提供服务增值的能力较弱,主要负责承担下游环节。而这主要是因为生产性服务业属于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其发展需要高端人力资本投入,而中国仍然是在较低端嵌入全球价值链^[19],这与其他发达经济体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与此同时,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信息化设施建设水平等营商环境质量方面还亟待改善,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质量,制约了生产性服务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

(二)服务贸易竞争力较弱

服务贸易已成为世界贸易的主要支柱。发达国家是全球服务贸易的主导者,它们长期掌握着全球价值链的核心环节,基本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近些年,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取得长足进步,根据商务部和中国服务贸易指南网的数据,中国服务贸易总额显著增长。2012—2023年,中国服务贸易总额从4 829亿美元增长至9 331

亿美元,连续10多年稳居全球第二位。中国服务贸易结构也在不断优化,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持续增长,结构不断优化。

但总体来看,中国服务贸易竞争力还比较弱,主要表现在:一是国际市场占有率不算高,与发达国家相比有一定差距;二是服务贸易逆差一直较为严重,特别是在一些高附加值的服务领域,如知识产权使用费、金融与保险服务等,逆差尤为显著;三是结构不尽合理,服务贸易结构以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等传统服务贸易为主,高附加值的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服务贸易占比较低;四是服务贸易竞争优势指数(TC)^①长期为负,2017年以来有所回升,但还是低于0,与欧美日的差距依然较大,甚至低于印度等金砖国家,服务贸易总体竞争力不容乐观。服务贸易与生产性服务业息息相关,服务贸易竞争力不强对生产性服务的质量和效率、生产性服务的国际化水平及其走出去的路径选择都有重要影响,因而会直接影响生产性服务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位置和路径。

(三)生产性服务业开放程度有限

服务业对外开放是提升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重要因素。然而,长期以来,中国生产性服务业面临较多管制和较低的外资开放程度,尤其是位于制造业上游的生产性服务业,其开放程度相对有限,致使经济增长潜力难以释放^[36]。此外,中国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还存在相对严重的行业垄断现象,其在金融、电信、保险、教育、通信、信息媒体、卫生等行业的市场准入限制降低了外资企业的参与度,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国内民营企业的参与,不仅导致服务业的潜在需求得不到满足,产业供给难以满足国内日益丰富的消费需求,而且导致要素分工和利益分配未充分发挥双向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效应,市场配置资源也未得到充分利用,从而使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在提升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中的作用大打折扣。中国服务业开放程度有限,既有历

史原因,又有随着国际贸易环境的变化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贸易壁垒和摩擦增多的原因,一些国家对中国生产性服务业设置市场准入限制,限制了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在全中国市场的拓展和布局。

(四)全球价值链框架下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良性互动发展受阻

发达国家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经验显示,在生产过程中,生产性服务业投入制造业的比重不断增加、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部门间相互作用日益加深并形成共同发展的互补关系是生产性服务业重要性逐步提升的显著表现,这主要是因为制造业扩张会引致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37],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需要依托生产率不断提高的制造业。但是,如果没有发达的生产性服务业,就难以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制造业部门。然而,现实是伴随制造业服务化进程不断加快,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不足且处于低效发展的状态,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并未对制造业带来显著的提升作用,甚至出现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前向和后向参与度产生负向影响^[6]。由此可见,国内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长期缺乏良性互动,且仍处于松散耦合阶段,影响了攀升全球价值链的“制造+服务”和“传统产业+互联网”的“两翼”发展,是中国至今未能跻身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的主要因素^[28]。

五、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策略选择

经济全球化的经验显示,生产性服务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较高位置对产业升级和经济增

①贸易竞争优势指数是一国进出口贸易的差额占其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该指数的计算公式为:TC指数=(出口额-进口额)/(出口额+进口额)。这一指数的值域为[-1,1],越接近于1表示竞争力越大,等于1时表示该产业只出口不进口;指数越接近于-1表示竞争力越弱,等于-1时表示该产业只进口不出口;指数为0时表示该产业竞争力处于中间水平。

长有着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和开放取得长足进步,正在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和嵌入全球价值链,且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逐渐提高,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为此,要主动作为,采取切实举措,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更加积极主动嵌入全球价值链,并不断提升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

(一)积极嵌入国内价值链,提升生产性服务业在国内价值链中的地位

生产性服务业积极嵌入国内价值链且不断提升在国内价值链中的地位,是嵌入全球价值链和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位置的重要前提。为此,需要采取如下措施:一是积极发展国内价值链,充分发挥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互补作用,构建完整的国内生产链条,推动国内经济一体化建设,同时持续推动全球价值链向国内价值链延伸,加快实现核心技术与关键零部件生产本土化,提高要素和产品出口的附加值,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二是在中国生产性服务业融入全球价值链过程中,积极发挥“学习效应”和“创新扩散效应”,引进、消化和吸收国内外先进技术和先进的学习理念,提升生产性服务业效率,提高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地位。三是加快数字经济发展,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在推动生产性服务业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和升级中的关键作用。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和开放要更加主动引入数字技术,通过数字技术的深入渗透和应用,增强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综合竞争力,从而不断提升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

(二)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突破高技术产业链发展瓶颈

不断增强中国自主创新能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牢牢掌握创新主动权和发展主动权,通过突破高技术产业链发展瓶颈,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位置。一是

积极引导企业注重提升自主研发水平,持续推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研发机构与企业之间的协同创新和合作,加强产学研用一体化建设,增强中国自主创新能力和原始创新能力,尽可能降低对海外高技术的依赖度,加强中国在核心技术领域的赶超,为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位置提供应有的科技支撑。在产学研用一体化建设过程中,必须筑牢“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这个基本理念,不能越俎代庖。企业作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本单元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力量载体,一头连着科技,一头连着产业,是实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微观主体。因此,要坚决打破束缚企业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充分发挥企业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中的主体地位。二是继续完善市场准入、产权保护、公正竞争、信用契约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高水平对外开放,通过投资促进效应和贸易创造效应拓展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嵌入全球价值链渠道,打通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关键堵点,以良性互动循环的国际市场环境助力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三是建立本土高技术产业供应链。培育和壮大链主企业,规范链主企业遴选标准,提供资金、人才、平台等支持。链主企业应担当起延链、补链、强链的责任,主动带动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形成有创新能力的高技术产业集群。四是适度加大对生产性服务业行业技术创新项目的支持和补贴力度,从物质奖励和精神激励两方面提高相关企业的创新能力,为加快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

(三)发挥数字经济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积极作用

数字经济作为现代经济活动的新形态,通过其创新驱动、拓展服务边界、扩大市场准入和业务范围、增强服务可贸易性、降低服务成本、加强国际合作和交流等特性,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

度嵌入全球价值链,助力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从低附加值环节向设计、研发、品牌、营销等高附加值环节攀升。生产性服务业作为促进技术进步和提高生产效率的关键行业,其与数字经济的融合,特别是通过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面的应用,已经成为推动其向价值链高端迈进的重要途径。未来,要更加重视发挥数字经济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积极作用。一是促进数字经济和生产性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全力推动信息化和智能化建设,提高生产性服务业的数字化水平和智能化程度。数字赋能要涵盖研发、销售、售后和咨询管理等经济价值创造活动的全周期,以此提高生产性服务业的参与度和产出效率。二是加快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加快培育推广规模化定制、网络化协同等新模式。面向制造、金融、物流、交通、检测认证等重点领域提供信息技术产品和综合解决方案,借力数字化转型提高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标准化水平,进而提高生产性服务业效率和质量。三是在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妥善处理数据开发与保障数据安全及用户隐私的关系。在数字经济时代,企业和用户大量的数据在各个环节中产生和流动,但目前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的法规制度尚不健全,企业和个人的数据面临泄露、滥用等风险,直接威胁到数字经济发展安全和可持续发展。要在数据信息的开发使用和隐私保护之间找到科学合理的平衡,确保政府、企业、用户之间的利益得到妥善平衡,不至于一方显著受益而另一方严重受损^[38]。四是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穿透融合能力强的优势,尽力推动技术在产业间的跨界融合,促进形成新业态、新工艺和新模式,提升制造产品附加值,推动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

(四)有序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发展和提升全球价值链参与度

当下,虽然中国经济体量与国际地位都排名靠前,但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发展程度依然较

低,生产性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低端锁定倒逼生产性服务业向价值链两端的研发和市场环节延伸,以此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一是充分发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等重点区域的引领作用,带动中西部地区共同参与到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加深各区域的嵌入程度,不断提升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二是不断引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所需的高质量投入要素,比如高端人力资本、高质量的生产性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先进的企业管理制度等,持续提高投资企业的要素质量,提升投资企业的后续服务水平,带动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以及更好嵌入全球价值链高端。三是全力打造“中国服务”的国家品牌,打造和培养更多具有高附加值和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服务品牌,推动“中国服务”与“中国制造”共同构成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竞争的新优势,提升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同时,依托数字技术抢占世界贸易风口,努力确保生产性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中稳中有升的良好态势,为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创造有利条件。四是实施企业走出去战略,为企业出海创造良好的环境,鼓励生产性服务业企业或高端制造业企业在海外建立研发中心、品牌管理中心和营销中心,提高企业海外运营能力和综合竞争力。

(五)积极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

产业融合是现代产业发展的重要趋势和主要特征,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融合发展备受瞩目。在数字经济时代,产业融合更为普遍、更加便利。数字技术和平台经济很好地把制造业企业和消费者链接起来,可以在供需两端共同发力,有效形成高水平的供需平衡,实现制造企业和消费者的双赢。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协同发展、互促双融是推动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和嵌入全球价值链更高位置的重要因素。一是促进产业组织政策、产业结构政策、

产业布局政策、产业技术政策等多种产业政策的创新、融合和协同,通过优化要素结构、创新组织生产方式、优化分工体系、重塑全球要素分布格局等,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良性发展,耦合嵌入全球价值链。二是创新生产性服务业现有商业运行模式,不断降低交易成本、优化创新环境,以更高效率的价值创造方式实现潜在规模经济,从而提高整个价值链的效率。三是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全要素、宽领域、高水平深度融合,促进中国产业向价值链高端跃升,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强大支撑,使之成为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强劲动力。四是以科技创新加速产业融合,促进形成新业态、新工艺和新模式,提升制造产品附加值,从而推动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优化数实融合的制度环境,大力发展智能制造,支持企业深化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发展智能装备和智能工厂,建设工业互联网、共享制造平台,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步伐,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39],以强大完整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生产性服务业嵌入和攀升全球价值链提供有力支撑。五是鼓励企业加强全生命周期管理,建设智慧供应链,实现产业链全链条、全周期、全流程效率提升和价值增值,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逐步实现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攀升。**Reform**

参考文献

- [1] 贾根良,刘书瀚.生产性服务业:构建中国制造业国家价值链的关键[J].学术月刊,2012(12):60-67.
- [2] 韩沈超.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与嵌入位置测度、影响因素及攀升策略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23(6):80-90.
- [3] MIROUDOT S, CADESTIN C. Services in global value chains: From inputs to value-creating activities[Z]. OECD Trade Policy Papers, 2017.
- [4] LIU S, CHEN X, GU N, et al. The mechanism of the evolution of global value chain driven by the collaborative agglomeration of producer services and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J]. Academic Journal of Business & Management, 2019, 1(1): 113-119.
- [5] 姚战琪.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制造业服务化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的影响——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研究[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1-10.
- [6] 黄繁华,洪银兴.生产性服务业对我国参与国际循环的影响——基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研究[J].经济学动态,2020(12):15-27.
- [7] 江小涓.服务全球化与服务外包:现状、趋势及理论分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 [8] 吕越,李小萌,吕云龙.全球价值链中的制造业服务化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J].南开经济研究,2017(3):88-110.
- [9] CHENG D, XIAO Z. Producer services and productivity: A global value chain perspective [J].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2020(2): 418-444.
- [10] 王欠欠,夏杰长.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提升与制造业技术进步[J].世界经济研究,2019(5):67-79.
- [11] HUMMELS D, ISHII J, YI K. The nature and growth of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in world trad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1(1): 75-96.
- [12] 黄蕙萍,缪子菊,袁野,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及其中国参与度[J].管理世界,2020(9):82-97.
- [13] JOHNSON C R, NOGUERA G. Accounting for intermediates: Production sharing and trade

- in value added[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2(2): 224–236.
- [14] 龚静,尹忠明.增加值核算体系下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的国际分工地位与竞争力研究——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的上游度指数与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分析[J]. *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18(5): 73–84.
- [15] 吕延方,方若楠,王冬.中国服务贸易融入数字全球价值链的测度构建及特征研究[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0(12): 25–44.
- [16] 周昕.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服务业比较优势:核算与比较[J].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 2022(1): 77–95.
- [17] 张皓羽,周升起.数字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及影响因素研究[J]. *兰州财经大学学报*, 2021(6): 36–49.
- [18] 刘金全,郑荻.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变迁与路径升级[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2): 14–21.
- [19] 陈健,赵迪,赵洋.中国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嵌入:生产分割解构视角的探讨[J]. *产业经济评论*, 2020(3): 75–92.
- [20] KOOPMAN R. Give credit where credit is due: Tracing value added in global production chains [Z]. *NBER Working Papers*, No. 11299, 2010.
- [21] WANG Z, WEI S J, YU X, et al. Characterizing global value chains: Production length and upstreamness[Z]. *NBER Working Paper* No. 23261, 2017.
- [22] YANG L, ZENG H, XU P. A comparative study of service trade competitiveness for green innovation development using the WWYZ model—based on China and the 26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2021, 85(2–4): 165–189.
- [23] 戴枫,孙岩,吕笠瞻.双循环背景下生产性服务业的双重价值链嵌入——基于中国省级层面的观察[J]. *南京财经大学学报*, 2024(1): 77–87.
- [24] 尹伟华.双循环背景下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的区域特征[J]. *中国科技论坛*, 2023(1): 100–108.
- [25] 魏方,丁鹏翔,魏思敏.信息化对中国承接离岸服务外包的影响——路径分析与实证检验[J]. *软科学*, 2019(6): 54–59.
- [26] 郭周明,裘莹.数字经济时代全球价值链的重构:典型事实、理论机制与中国策略[J]. *改革*, 2020(10): 73–85.
- [27] 戴翔,郑岚.制度质量如何影响中国攀升全球价值链[J]. *国际贸易问题*, 2015(12): 51–63.
- [28] 韩沈超,徐姗.制度质量如何影响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J]. *当代财经*, 2021(3): 112–123.
- [29] 周升起,李昌琴.对外开放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研究——基于门槛效应模型的实证检验[J].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2021(3): 56–67.
- [30] 张雨.我国服务出口复杂度及影响因素:增加值视角的新认识[J]. *国际贸易问题*, 2017(9): 83–94.
- [31] 杨仁发,张婷.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 *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5): 3–12.
- [32] 陈明,魏作磊.中国服务业开放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J]. *经济学家*, 2016(4): 24–32.
- [33] 马少华,郭彦鹏.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创新能力与出口技术复杂度[J]. *商业经济研究*, 2024(11): 153–156.
- [34] DUNMINGH J.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J].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

- nal, 2007, 3(1): 21–66.
- [35] 黎峰.要素禀赋结构升级是否有利于贸易收益的提升?——基于中国的行业面板数据[J].世界经济研究,2014(8):3–7.
- [36] 马弘,李小帆.服务贸易开放与出口附加值[J].国际经济评论,2018(2):82–92.
- [37] GUERRIERI P, MELICIANI V.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in producer services[C].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ETI Meeting Rome, 2003.
- [38] 胡东兰,夏杰长.数据作为核心要素的理论逻辑和政策框架[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107–118.
- [39] 夏杰长,苏敏.以数实融合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J].改革,2024(5):12–23.

Embedding China's Productive Service Industry into the Global Value Chain: Influencing Factors, Practical Challenges, and Strategic Choices

XIA Jie-chang XU Zi-yan YUAN Hang

Abstract: In the era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are increasingly emphasizing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ir value chain integration on a global scale and enhancing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their industries. In the process of embedding into the global value chain,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has achieved significant results, but the productive service industry, which is an important support for manufacturing upgrading, is clearly insufficient. Actively integrating the productive service industry into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enhancing its position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is an important means to promot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hanc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The integration of productive service industries into the global value chain and their position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are influenced by multiple factors such as digital technology,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openness to the outside world,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export product quality. The overall integration of China's productive service industry into the global value chain is still relatively backward, mostly at the middle and low ends of the global value chain. The degree of technological improvement of productive service industry enterprises is limited, the competitiveness of service trade is weak, and the degree of openness of productive service industry is limited. The benign mutual promotion between productive service industry and advance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global value chain still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 To change this situation, efforts must be made to enhance the position of the productive service industry in the domestic value chain, strengthen the independent innovation capability of enterprises, leverage the empowering role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ctively and orderly expand the opening-up of the productive service industry, and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productive service industry and advance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Key word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productive service industry; global value chain

(责任编辑:罗重谱)